

一些福壽螺教我的事

蔡晏霖*

原生於阿根廷的 *Pomacea canaliculata* (英語: golden apple snail, 華語: 福壽螺, 臺語: 金寶螺), 於 1970 末期經不同管道引進臺灣、日本, 與菲律賓, 短短幾年間迅速擴散蔓延。近四十年來, 臺灣學界與農政體系普遍認為福壽螺由商人走私引進, 因為在臺缺乏天敵而失控繁殖, 只能以農藥撲殺控制。這是工業現代性的標準敘事: 人類因貪慾而傷害脆弱的自然, 只好乞靈於現代科學。然而一個非常清楚的事實是, 農藥無法真正解決福壽螺蔓延的問題。據統計, 儘管年年施藥, 福壽螺在臺灣造成的直接農損每年依然高達二億臺幣, 隱形的社會與生態損失則達百億。換言之, 綠色革命與工業化農業無法為臺灣水稻產業與福壽螺提供有效的共生之道。

2016 年起, 我嘗試從跨學科、跨地域、跨物種的角度重新考察臺灣與亞洲的「福壽螺問題」。福壽螺的問題, 真的只是一個繁殖力強的物種在臺灣缺乏天敵的問題嗎? 來臺四十年間, 福壽螺與臺灣環境與社會產生了什麼樣的互動? 如果農藥殺不死福壽螺, 有沒有其他比較好的解決方法? 四十年以後, 我們有沒有新的途徑來理解他, 甚至找到方法與他共生?

我對以上問題最早思考與啟發來自於近年來盛行於宜蘭與臺灣其他農村的新型態友善耕作小農。有別於臺灣絕大多數的慣行農法水稻農採取農藥殺螺, 也有別於臺灣多數的有機認證農法以苦茶粕 (*camilla seedcake*) 來殺螺, 許多宜蘭友善耕作小農選擇不以藥殺螺, 而改採各種物理性的方式移除水田中的福壽螺。這是因為, 苦茶粕雖然屬於生物性的防治資材, 但苦茶粕施藥遇水以後所溶出的皂鹼與油脂對軟體與節肢生物依然具有廣效性的殺傷力。相反的, 友善小農採用的是複合性的管理方法: 首先以水位控制減少福壽螺的活動力, 再以人手撿除福壽螺,

*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並利用秧苗與雜草成長的時間差、逐步調高田中水位來誘導福壽螺吃雜草而不吃秧苗；少數小農更以手工育苗延緩插秧時機，好讓福壽螺吃不動已經長大的秧苗而改吃田間雜草。而一旦農民放棄用藥在短時間內除光福壽螺，也就給予了水田其他生物生存的空間，同時也為自己的產品在臺灣近年蓬勃發展的綠色經濟、安全無毒的消費市場上開創獨特的產品定位。換言之，透過農技藝的復古與創新，友善耕作小農嘗試將農民與福壽螺的關係從對立性的「害彼害己」轉化為「減量共存」，甚至進一步創造「協同生產」的可能。

我在 2016–2019 年完成的三篇文章，嘗試描繪的正是以上從「人螺對立」到「人螺共生」的共同演化之道。首先，我與美國實驗紀錄片導演伊莎貝卡伯涅（Isabelle Carbonelle）、人類學者安清（Anna Tsing）、以及宜蘭務農的夥伴蔡雪青（Joelle Chevrier）共同完成了一部實驗影像民族誌，*GOLDEN SNAIL OPERA: The More-Than-Human Performance of Friendly Farming on Taiwan's Lanyang Plain*（中譯〈金寶螺胡撇仔〉）。透過從不同物種尺度拍攝的影像與結合分析與想像的劇本實驗，*GOLDEN SNAIL OPERA* 從跨物種角度重新呈現宜蘭友善耕作水稻田裡的多物種連結與共生景象。而透過「實驗自然史」概念的提出與實作，*GOLDEN SNAIL OPERA* 也挑戰了西方知識體系對於不同的人、以及人與非人之間、在理解世界與打造生活世界能力上種種不同而且階層化的預設。2019 年的〈找福壽螺拍片：邁向去人類中心的人類學田野技藝〉一文（蔡晏霖，2019），藉 *GOLDEN SNAIL OPERA* 的拍攝過程進一步反思「跨物種溝通」的可能與限制，以及多物種民族誌所需要的田野技藝。同樣於 2019 年出版的〈Farming Odd Kin in Patchy Anthropocenes〉（Tsai, 2019），則從蘭陽平原水田與豪宅農舍交錯的奇特景象來對照友善耕作新農與慣行耕作老農之間不同的社會性實踐：當老農為了血親家族的再生產而紛紛選擇賣地離農，友善耕作新農則透過建立與福壽螺等水田生物的多物種關係—也是 Donna Haraway 的怪胎親屬（odd kin）關係—而為宜蘭開創新的農業生計可能。

從 2018 年起，我也更聚焦於對福壽螺進行縫合生物—社會（biosocial）取徑的歷史性與比較性研究。一方面，我正在嘗試重建福壽螺當年來臺與散播到亞洲鄰近國家的路徑。四十年來，坊間流傳關於福壽螺引進臺

灣的故事，大抵不脫福壽螺是由海外華人／商人走私引進臺灣，原本目的在於透過工業化繁殖與飼養製成螺肉罐頭外銷日本，數年後卻因口感不佳而被棄養，並隨著臺灣四通八達的灌溉渠道而蔓延至全臺水田。然而實際訪談當年引進福壽螺以及最初飼養與販賣福壽螺的業者，我發現福壽螺養殖背後的產業模式其實比較類似「種苗業」，而從來不是它表面上所宣稱的水產加工上游養殖業。由於引進初期奇貨可居，許多家戶競相在自家農田、水源地、廢棄的豬圈或養殖池、甚至在陽臺搭設簡易養殖池投入，並且在大量耳語宣傳與廣告行銷下，順著特定的親屬與經濟網絡才將這股養殖風潮推廣至全臺、甚至日本與菲律賓。

換言之，一旦釐清福壽螺的生物特性與擴散的歷史情境，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發現：福壽螺之來臺與擴散全臺，並非如農政界與學界想像只是因為生殖快速、缺乏天敵等「生物」特性而在臺灣「自然」蔓延，從而再製外來物種「入侵」臺灣的刻板印象。相反的，福壽螺從來臺、繁殖、散佈、到棄養，都是在特定歷史情境下，透過刻意、普遍且大量的人為操作與技術傳遞與族群經濟動員的人與非人生物能動性交織的不預期後果。

另一方面，我在臺灣、菲律賓、日本，與阿根廷進行中的福壽螺離散（golden snail diaspora）比較研究，也引導我逐步看見福壽螺與一地特定稻作耕作模式之間的關係。相較於阿根廷大規模粗放水稻乾式耕作模式、菲律賓的粗放小規模濕式水稻直播耕作、日本的精耕小規模乾式水稻直播耕作模式，臺灣歷經綠色革命後密集條植的濕式水稻耕作模式，恰好在插秧時機、秧苗高度、田間水位等關鍵環節上提供福壽螺繁殖與蔓延的極佳條件。在此研究視角下，福壽螺在臺灣的大量蔓延非但不是以農藥為代表的工業化農業體系可以解決的問題，反而還正是由臺灣的工業化農業所系統性地共構出來的問題。而他國與宜蘭友善耕作小農與螺共生的例子則正好從另一面提醒我們：不同的農耕方法實踐，確實可以帶來不同的人螺關係。

總之，透過追溯當地社會特定的水稻種植的物質與文化叢結（complex），及其中的人、非人，與非生物等多元異質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關係與歷史，我的研究導向了一個不同於以往亞洲「福壽螺問題」的對理解。在此觀點下，一個外來物種是否「有害」應視此物種與移入地

的環境條件、在地生物相、農業作物、耕作模式、以及更寬廣的非農政經社會條件的特定連結，這也是 Anna Tsing 所謂的「覆音式聚合體」(polyphonic assemblages, Tsing, 2015)。福壽螺從來就不是因為其生物特性或缺乏天敵而「有害」或「具有侵略性」：福壽螺在臺灣的快速散播其實是因為投機與種苗業式的繁殖模式；而福壽螺在亞洲社會的大量危害也與亞洲水稻耕作、尤其是臺灣水稻工業化的濕式插秧種植模式高度相關。若想真正解決臺灣的福壽螺問題，我們必須首先看得見以上福壽螺與臺灣社會共同演化的生物社會關係，也才能尋思什麼是我們所欲追求的農耕模式與人螺關係。

參考文獻

- 蔡晏霖。2019。〈找福壽螺拍片：邁向去人類中心的人類學田野技藝〉。
趙恩潔、蔡晏霖主編：《迂反田野：人類學田野異托邦故事集》，頁
317-343。新北市：左岸文化出版。
- Tsai, Yen-Ling. 2019. Farming Odd Kin in Patchy Anthropocenes.
Current Anthropology, 60(20): 342-353.
- Tsing, Lowenhaupt Anna. 2015. *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the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